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叙事的文化批评

李艳丰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 文章从三个层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进行文化学考察:一是从总体上论述城市文学的兴起以及城市文学叙事的多元审美旨趣与文化症候;二是从消费主义文化视域出发发掘90年代以来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想象性呈现,及其所包孕的文化价值矛盾;三是进一步论述9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铺陈叙写,批判城市文学在对消费主义文化趋骛与超拔的叙事张力所折射出的虚无主义价值观。

关键词: 90年代; 城市文学; 消费主义; 文化批评

中图分类号: I 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94X(2012)02-0085-07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城市化进程的加剧,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全球播撒,导致整体性文化结构的转型,同时也改写了20世纪以来的文学话语谱系。以乡土文学为主导的文学话语形态走向裂变,城市文学开始兴起并最终形成蔚为大观之势。“乡土中国”的审美意象,作为某种文化与文学原型,虽然还沉潜于许多文学知识分子的意识深处,但很显然,随着消费主义文化霸权的确立,乡土文学在城市文学的挤压之下,最终滑向文学场的边缘。本章试图结合消费主义文化语境来简要分析9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的文化症候。

—

自晚清伊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滋长,城市化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文化进程,乡土空间遭遇城市挤压,人群开始大量涌入城市。但因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一直处于外患内忧之中,城市虽然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带,但并未得到合理有效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由于城市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和腐败生活方式的象征,因而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和文化的改造对象。国营经济体制和供给制消费机制的建立限制了权力与资本在城市空间的拓扑,而政治意识形态的统合又宣告了城市文化精神的非法性。特别是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三反五反”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逆城市化”现象,一度造成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的中断。“文革”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开始走出政治斗争的混沌迷失,重新返回理性文明的现代化发展的正轨,而城市也逐步替代农村成为新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权力中心地带。特别是到了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消费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现代性文化进程。据统计,1990年我国城市只有467个,而到了1995年则增加到640个,1999年达到668个,全国城市人口从1990年的1.1825亿增加到1999年的2.3亿^[1]。城市化并不仅仅意味着新的地理空间的形成,而且表征着新文化场域的合法性建构。正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全球化市场机制的形成,经济大生产场域与消费广场等新都市空间的建构,城市人群的增长与市民阶

收稿日期:2011-10-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1YJC751043)

作者简介:李艳丰,华南师范大学讲师,从事文艺美学、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

层的形成,中产阶级与新富人阶层的兴起,以及城市空间的迅速审美化、媒介化、信息化,城市文化生活的市场化、欲望化和世俗化等,使消费主义文化霸权最终祛除了80年代启蒙精神、政治伦理与人文理性,转而生成了斑驳杂糅的城市文化精神和城市审美意识,它表现为理性与欲望的冲突交合,城市与乡土的互文渗透,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后现代意识与对城市异化病症现代性批判的并行不悖,城市市民阶层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产阶级精致高雅的生存景观与新富人阶层、上流社会奢华淫靡生活同台演绎等。

自20世纪以来,乡土文学一直居于文学场域的主导地位,“乡土中国”则成为现代文学知识分子永恒的乌托邦与还乡梦。李大钊的乡土梦幻,鲁迅的故园理想,沈从文的边城情结无疑是现代知识分子乡土意识的典型表现。强大的乡土文学传统与中国现代民粹主义精神的文化共谋,最终剔除城市文学的合法性在场。像《我们夫妇之间》、《霓虹灯下的哨兵》以及《上海的早晨》等小说,更多地是对城市形象、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文化精神的否定性再现。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开启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城市文学开始打破乡土文学的一元化格局并获得发展,市井文学、城市改革文学的兴起表征着城市文学被赋予文化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但乡土文学依然在文坛上占据主导地位。而到了90年代,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城市消费文化场域的建构、城市文化精神与城市审美意识的形成,最终催生了以城市叙事为主导的城市文学。描写城市景观、城市人群、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病理学的城市小说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深圳《特区文学》1994年第1期“卷首语”提出“新都市文学”,《上海文学》与《佛山文艺》联手于1995年推出“新市民小说”栏目并指出“城市正在成为90年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人文景观,一个新的有别于计划体制时代的市民阶层随之悄然崛起,并且开始扮演城市的主要角色……城市的发展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生长点之一。”很显然,90年代城市文学同30年代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的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徐訏、苏青等人的洋场市民小说,以及80年代的市井文学、城市改革文学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它面对的是新的经济现实、城市风貌、文化精神形态、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审美意识,“正是都市经验和由都市经验支撑的文本崛起,开

启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新局面”^{[2]348},“90年代城市文学对于城市社会巨大变迁的密集而强烈、鲜明而及时的表现,已使得文学呈现出在总体上向城市倾斜的态势,从而一举改变了秦汉以来的数千年时间内,城市文学始终作为乡土文学的附庸、点缀的局面。在此种意义上,文学由此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城市文学时代。”^{[3]4}像邱华栋之于北京,张欣之于广州,王安忆之于上海,何顿之于长沙,池莉、方方之于武汉等,众多城市文学作家的倾力演绎,形成了90年代蔚为大观的城市文学景观。

城市文学首先必须以城市作为文学想象与叙事对象,并对城市美学形象、城市生活方式、城市居住人群、城市文化精神进行审美呈现。由于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外在形态与文化肌理,而作家又具有各不相同的城市审美意识、城市感性经验和文化精神诉求,因而对城市形象的表现也各有差异。如具有浓郁乡土意识的作家在面对城市时,表现出的是对城市形象的否定和丑化,典型如贾平凹、张炜等。贾平凹的中篇小说《废都》表现的是土城文化形象的颓败和文化精神的沦丧,张炜《柏慧》中的城市则是喧嚣与非人化的存在,对城市形象的贬抑和对乡土意象“葡萄园”的美化形成鲜明对照。在《融入野地》一文中,张炜甚至说道“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很显然,“野地”意象表征的是未被现代工业文明污染的“最后村庄”和终极家园。

而到了90年代的城市文学作家那里,城市形象已经不再是乡土作家所极力渲染的单一性恶魔形象和城市梦魇,转而变得复杂而多元化。随着现代性理性文明的发展,城市作为负载政治权力、经济资本与文化价值的新的交往空间,已经无可规避地成为现代性审美意识的栖息地。城市既是理性、理想、成功、身份、资本与权力的象征,同时又滋生欲望、颓败、孤独、苦闷、冷漠与封闭等城市文化病症。城市既是华丽而高贵的莎乐美,又是狰狞与残酷的墨杜萨。这种关于城市的复杂文化意识决定了城市想象的复杂性与多元化。正因为如此,作家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城市审美形象和城市文化精神。如王安忆的《妙妙》表现的是妙妙对城市文明的期许。城市表现为理想化的乌托邦镜像,是人类理想生活状态的隐喻。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则将城市视为颓败的家园,“我”近似于波德莱尔笔下的城市漫游者,而

城市则是腐败的“恶之花”。池莉、方方、刘震云、何顿的小说,则着重呈现城市市民阶层日常生活的世俗化风景,他们对城市的表现更多地落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城市的一切与市民阶层的感性经验与文化精神相连。邱华栋、张欣小说中的城市形象则是奢华而壮丽的,充分表现出中产阶级的文化审美趣味。王安忆的《长恨歌》、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对城市的想象充满怀旧的感伤,其间也流露出对精致与高雅都市文明的念想。林白、陈染对城市的想象充满孤独和冷漠,城市不是理想的居所,反而是城堡与荒原。卫慧、棉棉、戴来、魏微小说中的城市则是消费与狂欢的盛宴,是充满后殖民气息的人间天堂。叶辛、刘庆邦、李肇正、鬼子小说中的城市,则是幸福与苦难、天堂与地狱的矛盾集合体,是都市底层人群命运的流放地。不同地域,不同城市作家的城市想象也有明显不同。北京作家在叙写北京时,往往更多地去展现北京作为帝都、家园的文化身份,以及其独特的政治文化气息、京味儿文化传统以及现代大都市的文化景观,像刘心武、王朔、邱华栋、丁天等人的北京想象,虽然各不相同,但却不能完全脱离北京的城市形象、文化精神和审美价值形态。上海的文学形象则与北京有着明显的不同,作为长时期遭受殖民的现代大都市,上海一方面被视为是衍生产业阶级腐朽文化的所多玛城,同时又因为国人对西方现代性的艳羡而成为中国现代性理性文明的翘楚。此外,像张欣的广州书写,何顿的长沙书写,池莉、方方的武汉书写等,其实都同城市自身的文化肌理有着本质的联系。作家从自我的城市经验出发,通过自身的观察、体验与审美,形成了文学中不同的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精神。

90年代城市小说表现出纷繁芜杂和众声喧哗的叙事、审美格局,既有市民化与都市场民的审美文化诉求,又有中产阶级和后殖民主义的文学想象;既有对普通市民城市日常生活的世俗化叙写,又有对中产阶级精致与高雅生活的浪漫铺陈;既有对“向城求生”之都市底层人群苦难生活的文学再现,又有对新富人阶层和上流社会之奢华淫靡生活的反讽式观照;既有对城市理性精神和文化审美空间的讴歌与颂赞,又有对城市病理学症候一览无余的审视与批判;既有对城市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消费主义时代声光化电的庄严膜拜,又有对城市堕落沉沦与藏污纳垢之文化根性的无情揭示。由此也可以说,90

年代城市小说的文化精神表现出明显的复调性与多声部症候。必须指出的是,在这种多元化的叙事向度与审美意识背后,似乎又有一条若隐若现的根茎将90年代城市小说串接起来,这条根茎就是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城市同消费主义文化的天然结盟,使得城市小说的审美想象同消费主义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下面,笔者试图从消费主义文化视角来进一步反思90年代城市小说的文化意义。

二

现代城市既是政治权力、经济与文化资本得以衍生的空间结构,同时也是大众日常消费实践的中心。消费主义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主要依托于城市这一特定的文化交往空间。城市负载着强大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这些权力和资本成为推动城市不断壮大的主要动量。城市有完善的生产销售网络和消费中心,公司、工厂、批发市场、展销会等生产、推销出琳琅满目的商品,酒店、宾馆、咖啡屋、茶楼、夜总会、桑拿室、超市、购物广场等则为城市大众时刻准备着丰盈的消费盛宴。城市有着成熟的信息资讯、商业广告和文化传媒,城市有着你永远无法追赶的时尚和流行。城市的街道旁高楼林立、绿树茵茵,橱窗内商品琳琅满目,足以让城市闲逛者领略都市日常生活的审美景观。如费瑟斯通所言:“城市脱离工业化转而成了消费中心,并汇聚起各种壮观场面、混合的符码,使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融合为一体,从而导致了一种面向后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4]153}“在新城市空间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所有那些后现代与后现代化的趋势:规模越来越大的城市建筑,以审美的形式呈现常人的生活,新的消费与闲暇之地如购物中心、主题乐园、博物馆的发展,新型中产阶级返回到内城地带聚居。……一些新的城市生活方式表明了认同中心的消解,人们更有能力从事放松了控制的情感活动及审美游戏。”^{[4]163}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90年代的城市同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眼中的城市还有很大差距,仅有少数大都市表现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城市消费景观,但城市作为大众日常消费的中心场域,已是不争的事实。正是由于城市的这一文化症候,9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在叙写城市形象和城市文化精神时,不自觉地陷入了消费主义文化的权力桎梏。当然,城市文学并未

完全成为贩卖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符号战场,而是说消费主义文化形态将不可避免地要成为90年代城市作家构建文学想象的文化资源。由于作家各不相同的城市经验和审美意识,其对城市消费主义文化的态度也有很大的不同,有的表现出极度的艳羨与期待,有的则表现出抵制和批判的态度,有的则抱着暧昧的价值立场。

消费主义信奉消费至上,把物欲的满足和感官的享受作为人生追求的主要目标。因此,对商品和物化现实的追求,就成为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元素。波德里亚说道“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的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5]城市文学在反映城市形象和城市文化精神时,必然无法超越商品意识和物化现实来观照城市,“对于都市小说来说,它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两个关键性的因素:一个是文学将视点聚焦在城市之上,这是都市小说出现的一个前提;另一个则是商品的理念在小说中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它是都市小说成为自身的本质规定性”。^[3]⁶⁸阅读90年代以来的城市小说,我们发现大量表征物质主义的符码充斥于文学叙事之中。首先是对金钱意识与物质文明的文学想象。90年代的城市小说不再掩饰对金钱等物质符码的追求,不再将勤俭节约的清教徒生活视为典范,反而开始直面世俗化与消费化对生存现实和内心精神的冲击。如池莉的《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以及《有了快感你就喊》等小说,渗透着浓烈的消费主义意识与物质主义哲学。邱华栋曾在一次同刘心武的对话中坦言“既然机会这么多,那就赶快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时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入上层阶层了。”^[6]而像他的《手上的星光》、《哭泣的游戏》、《城市战车》等小说,无疑是对这种物质主义价值取向的最好诠释。何顿小说中的主人公经常表现出对金钱的极度膜拜,《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中的何强说“现在这个社会只谈论两件事,谈钱玩钱,人玩人”,《生活无罪》中的曲刚认为“世界上钱字最大,钱可以买人格买自尊买卑贱买笑脸,还可以买杀人”,这种盲目的拜金主义意识反映了90年代城市市民阶层对物质主义精神的迎合。朱文的《我爱美元》,韩东的

《美元胜过人民币》等,对物欲的宣泄更为赤裸和露骨。王安忆的《歌星日本来》通过歌星的走穴和艺术世俗化来反映理想主义的终结,同时也宣告了物质主义时代的莅临,《长恨歌》有对物质文化的渲染,《香港的情和爱》则显然是对物质主义一次更为随俗的认同“香港的情义是用东西来表示的,香港的东西有多么多,情义就有多么多。”“香港的男欢女爱,总带有酒足饭饱的味道,是由衣食住行打底的。”物质主义的文化精神改写了情与爱的本质,纵然肤浅却更为真实。张欣的小说如《首席》、《爱又如何》以及《浮华背后》等小说,对都市空间物质主义生存状态的铺陈叙写,更为精致、浪漫而奢华。张梅在《孀居的喜宝》中甚至坦言“我们都抓住了世界的本质,我们都爱物质文明,我们不作茧自缚。”而像唐颖、潘向黎、赵波、卫慧、棉棉、魏微等人,对都市物欲生存状态的文学想象显得更为放纵和张扬,如卫慧在《像卫慧那样疯狂》中所言,她们所信奉的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亦如魏微在《从南京出发》中所言“我们来自享乐主义盛行的南方,追求物质、奢华和艳情。我们必须择城而居,过最明亮的生活。我们的理想国是北京、上海和南京。趁我们年轻,让我们享受。”其次是对城市形象和消费物质景观的审美呈现。城市是大众生存的主要场所和文化空间,同时也是城市小说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城市作家对城市形象的审美和对城市消费场域的表现,就成为城市小说必然的美学元素,没有对城市形象和城市环境的审美呈现,所谓的城市生活和城市精神必然处于无根的漂浮状态。当然,不同作家在表现城市形象和城市消费物质空间时,肯定会有各不相同的价值立场,如刘心武在《钟鼓楼》中对北京的钟楼、鼓楼和胡同文化的描写,乃是为了表现北京的历史意识和市民文化精神,王安忆的《长恨歌》开篇就是对上海弄堂形象的描写,弄堂是上海人日常生活的聚散地,弄堂里有流言蜚语,也有假意真情。“爱丽丝公寓”则成为都市民间最为真实的隐喻,王琦瑶在这里度过她最为高贵而精致的生活。弄堂与“爱丽丝公寓”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空间,但毫无疑问,它们共同构建起演绎王琦瑶命运沉浮的人生舞台。卫慧、棉棉等人的小说,主要对当下上海的城市形象和消费物质景观展开文学想象,在她们的小说中,名贵汽车、飞机、地铁、爵士乐、街头的霓虹灯、酒吧、咖啡屋、迪厅、高级

会所、酒店、购物广场以及各种名牌时装、奢侈物品等物质意象 频频出场 构成五光十色的城市物质消费景观。邱华栋的小说甚至被称为“城市地理学”，他对北京的城市地理与物质景观进行了真实再现。张欣笔下的城市同样表现出华丽奢靡的一面，但她更多地是将目光聚焦于各种消费文化场所，如咖啡馆、高级会所、时尚屋、大酒店、购物广场、休闲中心等，通过对各种消费物质景观的叙写来表现城市白领和中产阶层浪漫奢华的物质生活。纵观90年代以来城市小说对消费主义物化状态的审美呈现，可以看出，城市作家不再像乡土作家那样，以反现代性的审美意识来否定、丑化城市形象和消费物质景观。城市物理空间的拓展和城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乃是现代性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产物，城市本身完全可以成为审美的对象与诗意栖居的家园，追求合理的物质消费并非就是精神的堕落和可耻的享乐主义，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处理物质欲望和人文精神的关系，而能否恰当地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成为衡量90年代城市小说的文化价值标准。必须指出的是，90年代城市作家在叙写城市时，虽然敢于破除禁忌，张扬欲望，真正直面城市物化与消费带给精神世界的冲击，但相当多的城市作家表现出暧昧与迷惘的精神姿态，他们看到了消费主义时代的人性异化，也或多或少地在小说中表现都市人面对物化的焦灼与苦闷，如林坚《别人的城市》对城市物化意识的抗争，邱华栋的“城市空心人”系列，张欣小说所流露出的对都市人性牧歌式的温婉抚慰，朱文颖《高跟鞋》中所折射出的物质与精神冲突等，然而在城市物质主义盛行的当下，他们所表露出的价值关怀似乎格外有限，也很难真正生成理性的城市文化精神品格，反而在欲望宣泄与消费狂欢中变得破碎而零散。有许多城市作家甚至表现出对城市物质文明与奢侈消费的过度艳羡，转而追慕欲望的舞蹈、信仰一晌贪欢的快感，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立场彻底放逐了理想主义的精神戒备和人文精神的审美呵护，最终走向颓废与媚俗。

三

90年代消费经济的兴起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意味着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将成为城市大众必然的想象与现实，如销售分析家勒博所言，我们庞大而多产

的经济“要求我们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7]15}所谓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在生活中纯粹追求物的使用价值消费和物欲的满足；二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交换价值的消费，追求商品的含金量，以炫耀自己的金钱富足，即如凡勃伦所说的炫耀性消费；三是符号价值的消费，要求在消费中突出商品的符号价值，即商品的文化内涵，以表现自己的身份、个性和文化品位，即如波德里亚所言：“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做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5]46}消费主义向人们承诺，对物的追逐能为他带来最大的幸福，“我买故我在”，不消费就衰退。城市作为消费主义文化衍生的物质空间，必然也会成为负载消费主义价值观念的文化母体，而城市作家在叙写城市生活时，不可避免地要对城市大众的消费主义生活情境进行想象性呈现，以此来凸显真实的城市生活形态和城市文化精神。90年代以来城市小说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文学想象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市民化的世俗性消费、中产阶级与新富人阶层的炫耀性消费以及符号性消费。

池莉、刘震云、范小青、何顿等人的城市小说，对城市市民的世俗化消费场景进行了写实主义的文学再现。如池莉的《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范小青的《城市民谣》，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何顿的《生活无罪》等，从城市市民世俗化的日常生活着眼，来表现城市市民阶层的物质生活情境和文化精神状态。在他们看来，市民阶层的生活宛如“城市民谣”，既没有上流社会奢侈豪华、欲望横流、醉生梦死般的生活，也没有中产阶级和白领丽人的高雅舒适，反而有一种淡定从容、不饰雕琢的朴素。城市市民阶层对生活充满憧憬与期待，在并不充盈的物质环境中，仍然坚信“太阳很好”、“生活无罪”，因此总能够以倔强而坚韧的姿态化解日常生活的繁琐平庸。城市市民不拒绝物质消费带来的欲望与快感，但也不艳羡大富大贵、奢侈淫靡的生活。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没有理想主义的激越，也很少有对时尚的跟风，反而更为持重丰衣足食、随意洒脱的市民文化精神。池莉小说《生活秀》中的来双扬无疑是这种市民文化精

神的典型代表,她完全可以去追求更多、更好,她可以嫁给卓雄州,过富家少奶奶的生活,但来双扬却最终选择了在吉庆街卖鸭脖子,“吉庆街的来双扬,这个卖鸭颈的女人,生意就这么做着,人生就这么过着。”范小青的《城市民谣》再现了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图景,主人公钱梅子经历了下岗的失意、自主创业的成功,但她始终以淡定从容的姿态面对生活。何顿的小说反映了城市市民在物欲迷乱中的挣扎、反抗与沉沦,以及“掘金时代”人性的嬗变和精神的失衡。像《我不想事》、《生活无罪》、《不谈艺术》等小说,既有对城市市民欲望化生活和物质消费图景的想象性呈现,对利益重新分配时期社会灰色地带的大胆揭示,又有对文化精神之世俗化、消费化的悲情告白。他的小说在凸显社会之恶与人性之恶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融入市民文化精神中温婉柔情、善良敦厚的一面。

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既是资源的重新整合,同时也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正是由于资源的重新积聚与分配,使中国社会阶层出现分化,新富人、中产阶层与白领人士开始在城市崛起,并成为城市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这类人拥有殷实的经济与文化资本,熟悉城市生活,引领时尚流行,是90年代城市消费空间高贵与华丽的莎乐美,也是90年代城市大众顶礼膜拜的文化英雄。在消费主义话语霸权下,“中产阶层”的文化趣味开始弥漫渗透于城市生活之中。90年代的许多城市作家,特别是“晚生代”和“70后”作家,正是以这类人的生活作为文学想象的话语资源,进而建构起一幅幅奢侈绮丽的城市消费地形图。像池莉的《来来往往》、《有了快感你就喊》等小说,已经放弃了早期的民间化立场,由表现市民“倔强的活”、“好好过日子”演变为“好好的活”、“过好好日子”,并流露出对城市消费主义人生的艳羨与期许。肖鹰曾在评价《来来往往》时指出:“这部小说中的作者的价值判断处于世俗价值观念水平线下,是一种零度价值判断。实际上,《来来往往》只是一片缀满消费时代畅销的欲望形象的无心风景。”^{[8]291}小说中的康伟业、林珠等人,无疑是90年代新富人和中产阶层的代表,他们追求奢侈性消费,将物质消费同自我身份的联系表示联系起来,甚至以消费能力和消费方式作为衡量人身份、品位的价值标尺。邱华栋城市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拉斯蒂涅式的城市历险者,如《手上的星光》中的乔可、杨

笑,《哭泣游戏》中的“我”、黄红梅等,他们通过自己的奋斗与拼搏,逐步从城市移民变身为城市的主人,但他们在获取权力、资本与身份的同时,也同时得到城市馈赠于他们的各种疾病与苦难。他们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视为自己膜拜的宗教,将欲望、知识、感情、身体一一编码为消费资本,以此作为兑换成功的筹码。当然,邱华栋在刻录城市消费主义文化图景时,并没有一味逢迎消费欲望的鼓噪与张扬,而是借助于文化精神的反省式观照,来为堕落与颓废的人性赎买失落的心魂。张欣的城市小说被评论者称为“中产阶级写作”,韩子勇曾在《都市梦境和中产阶级写作》一文中说道:“公司的公关部或设计室,精品屋,酒店和咖啡屋,沙龙式聚会,名牌服饰和高档轿车,精心修饰的装束和有教养的谈吐……所有这些‘中产阶级’的生活细节构成了她小说中重要的中心符号。”^{[9]291}张欣自己也曾坦言:“我实在是一个深陷红尘的人,觉得龙虾好吃,汽车方便,情人节收到鲜花便沾沾自喜;当然我也对沦落街头的人深表同情,对失学儿童捐款热心,痛惜妙龄女郎因物质所惑而委身大款……”^[10]在张欣的小说中,主人公大多是高级白领和成功人士,他们有稳定的工作,丰厚的收入,身着名牌时装,出门以名车代步,住高级社区、乡间别墅,经常出入于高级酒店、休闲会所、咖啡馆等消费空间,他们以奢华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来引领城市的时尚与流行,以炫耀性消费来表现自己的身份与品位,但同时又具有中产阶级不媚俗、不乖张、高贵而矜持的精神气质。小说《岁月无敌》中主人公千姿的出场总是伴随着“爱快罗密欧”跑车等奢侈消费品,因为奢侈是身份的标识。《首席》中的欧阳飘雪、梦烟,追求名贵时装,“穿衣镜前,欧阳飘雪左右各提着一套时装,时装平撑在衣架上,分别是卡佛连和华伦天奴。柔软而高级的质地,优雅的线条,毫不夸张的样式,无不透出无言的高贵。”时装不再仅仅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是物质奢华的体现、高贵身份的象征。唐颖的小说同样表现出对中产阶级消费趣味的迎合,《丽人公寓》中的宝宝喜欢名牌时装,追求官能享受和物质欲望的满足。此外,像卫慧、棉棉、魏微、朱文颖、戴来、周洁茹等人的城市小说,均表现出对城市中产阶层、白领与成功人士之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某种艳羨与期许。这种随俗的文学想象和文化认同,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90年代城市文化精神的变迁,以及城市消费主义意识

形态对整个文化场域的隐形操控。

90年代城市小说对物欲化和商品化的叙写,以及对物质消费景观的审美素描,同消费主义文化逻辑保持了内在的一致性。城市作为“膜拜商品的圣地”(本雅明)必然会成为消费主义的天堂,因此,城市小说不可避免地要对城市大众的物质欲望和城市物质消费空间进行想象性呈现。但城市小说并不是浅表化和世俗化的商品购物指南与消费主义地形图,而是艺术想象和审美结晶而成的文化精神形态。因此,城市小说的主要价值旨归还在于以文学想象的方式来表征城市作为一种文化结构场域的多维度精神症候,如城市的商品化必然形成拜物教和人性的物化状态;城市物质主义的解欲望化必然导致理性的失范和理想主义的沉沦,进而因价值错位或缺失而生成虚无主义;城市的消费化与世俗化必然带来精英文化的祛魅甚至解体,出现如马尔库塞所说的“高层文化失去合法性”^{[11]52},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填平鸿沟”必然导致人性自我深层文化体验的解构,进而形成浅表化与媚俗化;城市化所带来的权力拓扑、资源积聚、资本增值和分配失衡等,在消除利益均沾的公平效应后,必然导致新的阶层分化和城市弱势群体的产生,他们如何构筑城市的底部,城市又如何赋予他们物质与精神的馈赠等。城市作家在进行城市书写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面对

这些多元文化主题来构建文学想象,进而形成独特的文学叙事格局、审美价值立场和文化精神内涵。

【参考文献】

- [1] 薛小和. 以大城市为主导还是以中小城市为主导 [N]. 经济日报, 2000-05-19.
- [2] 杨匡汉. 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 [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6.
- [3] 蒋述卓. 城市的想象与呈现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4] 费瑟斯通.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M]. 刘精明,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5] 波德里亚. 消费社会 [M]. 刘成富, 全志刚,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6] 邱华栋, 刘心武. 在多元文学格局中寻找定位 [J]. 上海文学, 1995(8).
- [7] 杜宁. 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 [M]. 毕聿,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 [8] 肖鹰. 中国跨世纪的后现代文化症候 [M]. 王岳川. 中国后现代话语.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
- [9] 韩子勇. 都市梦境和中产阶级写作 [M] // 张欣. 流年.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5.
- [10] 张欣. 深陷红尘, 重拾浪漫 [J]. 小说月报, 1995(5).
- [11]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责任编辑 尹朝晖]

Cultural criticism of urban literature narration since the 1990s

LI Yanfeng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Guangzhou , Guangdong 510631 ,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makes a culturologic study from three levels of the city literature since 1990s: one is an overall discussion of the rise of urban literature and its diverse cultural and aesthetic purports; the second i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maginative presentation of consumerist culture since 1990s and the contradictions connotated in consumerist value; The third is to further expound the narration of consumerist ways of life in city literature which is criticized for its nihilism values reflected in its efforts to either follow or transcend consumerism.

Key words: 1990s; city literature; consumerism; cultural criticism